明天文库·传学跋涉者丛书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6年度一般项目

中国新闻社会史

(1815—2005)

李 彬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课堂讲录。主要讲述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演进，特别是勾勒鸦片战争以来新闻业的历史轨迹，同时透视其间纷繁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动因。通过这些讲述和勾勒，不仅揭示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历程及其规律，同时也探讨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

本书可作为新闻专业、传播专业学生的教学用书或参考书，同时也可供一般读者参阅。

主　编　语

传播学一传入中国大陆，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就热闹起来，特别是新闻传播教育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是传播学成为热门专业，传播学研究著作、教材、论文让人目不暇接，据不完全统计，20 多年来，全国共出版传播学类教材 400 多部，传播类研究专著1 000多部，译著 100 多部，发表传播学类论文3 000多篇，召开传播学类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100 多次；二是传播学名词成为最时髦的用语，有 50 多所学校新闻院系改名为“传播系”或“新闻传播系”或“新闻与传播系”；三是一批学者转行，有的原来是教新闻学的，现在纷纷教传播学，有的更是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外语、艺术甚至从计算机等工科专业跳到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队伍从没有今天这样“人才济济”，“三教九流”都有；四是新闻教育从“廉价”的教育一下子变成“奢侈”的教育，许多学校以数十万、百万、千万的财力投入建设新闻传播学科。

新闻传播教育如此繁荣是我们始料不及的。现在，新闻传播教育不仅是吃香的专业，甚至是急剧膨胀的专业。以我之见，新闻传播教育规模已经慰为可观，但新闻传播研究水平并未上去。何以见得？一是新闻传播思想研究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学术研究禁区还较多，几十年来遗留的旧的、左的新闻传播思想还弥漫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二是对西方传播思想研究不全面，缺乏科学的分析，“拿”来不少，消化不多；三是缺乏对中国本土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缺乏对中国传播话语的建构；四是现有研究成果数量很多，质量不高，浮躁有余，学术风气不好，缺乏认真的学术讨论，特别是缺乏学术批评。

我们几个人，虽不算新闻传播学界的新兵，但至今也只能算是新闻传播学的爱好者和跋涉者。这几本书也只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读书笔记，供传播学大方之家茶余饭后批批点点。



2007 年 5 月于上海

代序：谈谈历史哲学与新闻传播史研究

——在全国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上的演讲

在新一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倾力组织与精心安排下，“全国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终于如期举行了。承蒙组织方的厚爱，安排我来讲一次。当然，我自己没有什么“高级”的东西可谈，倒是希望借这个难得的机会，把自己一些“初级”的想法拿来与大家一起探讨，同时希望大家能够有以教我。

2001 年，我初到清华时，临时接手了一门新课——“名记者研究”。这门课上，我邀请了十几位卓有成就的名记者，包括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梁衡、曾经重走长征路的《经济日报》副总编辑罗开富、《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中央电视台的敬一丹以及几位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如采写张海迪的首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郭梅尼等。每次邀请的时候，他们都会问讲什么。我告诉他们，就讲两点好了，一点是自己的经历，一点是自己的经验。后来，我发现这样讲的效果出人意料的好，因为将经历与经验融合在一起，不仅生动有趣，而且更能给人留下一些鲜活的印象和启迪。借用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一个说法：其实人间的一切大道理，都可以通过常情常理来度量。这门课结束后，我让学生对整个课程内容加以整理，最后出版了一部《名记者清华演讲录》。虽然该书定价近 40 元，但第一版4 000册很快销售一空，最近出版社又加印3 000册。这门课程给我今天的演讲一个启发：本来，我准备了一个比较庞大的东西，大约有 3 万多字，而且显得书面化、学术化。后来，我想如果照此讲下来，估计在这样的炎炎盛夏非把诸君听得昏昏欲睡不可。所以，最后我决定今天就不讲太多宏大理论，而谈点自己研究新闻史的“经历”与“经验”，其中自然包含着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体会和反思。

下面我就先来讲第一点，即我在新闻传播史教学科研方面的“经历”

整整 20 年前的 1984 年，我调入新组建的郑州大学新闻系任教。当时，分派给我的课程就是“外国新闻事业史”。大概因为这门课还没有人主动承担，而我在试讲时又讲的是 VOA 吧。不过，大学四年学新闻时，我就对外国新闻业挺感兴趣的。那个时候，可以参考的书刊资料非常少。这么说吧，现在的东西是想看看不完，而那时的东西是想看没的看。记得，那个时候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过一个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什么的。我的老师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我从他那里可以经常搞到一些这类东西。回头想一想，人生的路就是这么阴差阳错。正因为我的老师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所以我能看到《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等。也正因为我

看了这些东西，所以对外国新闻业发生了兴趣。正是这种兴趣，我在试讲的时候就确定了 VOA 的题目。因为有了这个题目，我就成为郑州大学新闻系“外国新闻事业史”的主讲老师。一切似乎既是偶然，又是必然。

20 年前的大学还不像现在这么闹腾，这么喧嚣，这么浮躁。日前，我们学院的一位毕业研究生去了北京某高校，新学期一开学就要上两门课。20 年前，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初登讲台时都是一门课，而且还得先进修，先备课，先试讲。而现在，这些过程似乎都省略了。当时，我被派往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进修，与我同时的一批青年教师则分别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等，听起来似乎都比我好。然而幸运的是，我在暨南大学遇到了一批现在恐怕已经非常难得且出类拔萃的优秀学者，他们对我的学业乃至一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负责指导我的梁洪浩先生更是令人高山仰止。

梁先生今年已经 80 多岁了。当时，他不仅是系里的元老重臣，而且也是系里的灵魂人物。我一去就听说许多他的故事，学生们对他更是佩服有加，说起来总是赞不绝口。那个时候，曼彻斯特的巨著《光荣与梦想》刚刚开始流行，而学生们提到梁先生，都会自豪地说道，他是这部名著的译者之一。梁先生早年做过新华社记者，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每次同我提起这些陈年往事，老先生都像年轻人一样，激情洋溢，热血沸腾。能跟这样的名师学习，真是我的荣幸。

我到暨大后，梁先生为我专门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进修计划，有一二十页之多，包括要求、目标、进度、任务、书目等，而且这些内容都是他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写下来的。我拿到这份计划，一方面不胜感动，另一方面又特别沉重。尤其是那份书目，大概百十种之多吧，基本上都是我闻所未闻的东西。记得我曾嘟囔了一句，需要看这么多的书啊。先生回了一句，我是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的标准制订的计划。听他这么一说，我一方面感到压力更大，另一方面又不免有点受用了。为什么呢？因为，要知道 1980 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系研究生们的水平是相当高的，现在的博士生也难以达到，比如艾丰、陈力丹、孙旭陪、李希光等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是那个时候毕业的。

拿到进修计划后，我就开始昏天黑地地干将起来。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原来是多么无知，而且越学越觉得无知。广州的冬天阴冷阴冷的，真叫寒气凛冽，砭人肌骨；而夏天又闷热闷热的，还有令人奇痒无比的蚊叮虫咬，睡着了还会忍不住抓挠，结果弄得体无完肤，惨不忍睹。加之当时住宿条件又不太好，我们几个进修教师就住在一个十分简陋的工棚里，旁边是一大帮跟民工差不多的进修生。后来，梁先生每言及此总是带着歉意，说对我的生活关照不够。其实，我觉得吃点苦受点累也是一种考验、一种历练。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如果什么都舒舒服服、顺顺当当，那么恐怕也就成就不了什么事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进修期间，我一边听课、看书、钻研学问，一边死命学外语。一年时间，愣是把英语专业高年级的两本《Advanced English》和两本配套的《Teacher's Book》给学完了。另外，梁先生还给我找了一批英文资料，一来让我学习，二来让我试着翻译。其中，有一篇论述《华盛顿邮报》女记者库克，由于一篇瞎编胡造的报道而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后来事情败露又被取消奖项的丑闻。这篇万把字的文章，我差不多用了一个春节寒假的时间才初步译完，而且许多地方自己也似懂非懂。开学后，拿给梁先生审查，结果先生逐字逐句做了批改，一篇文稿上尽是红笔涂写的痕迹。看了先生的批改，自是佩服不已，同时第一次懂得什么叫学识渊博，什么叫治学严谨。

虽然仅仅进修了一年，但自己觉得比大学四年还有收获，仿佛一下把整个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回来后，就准备开课。幸赖那个时代高校氛围比较宽松，比较自由，没有现在的这个量化，那个指标，这个压力，那个负担，年轻教师差不多都是一门心思想着把课上好，把书教好。郑州大学新闻系给了我一个学期的时间备课，现在想一想似乎不可思议。可是，这在当时非常正常，非常平常。因为，按照要求上课首先得写出讲稿或讲义，不像现在好像只需凭着一张嘴，再加一些花里胡哨的幻灯片，就可以开课了。而一门课程的讲稿或讲义少则十多万字，多则二三十万字，如果没有一定时间的准备，怎么可能完成呢。现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李磊教授，前年出版一部外国新闻史的教材，颇有新意。而这部著作，就是他当年在兰州大学讲授外国新闻史的讲义，开始只是内部印行，还曾获得兰州大学优秀讲义一等奖。

由于进修、备课等，我虽然 1984 年就已是郑州大学新闻系的教师，但第一次开课却已经是 1986 年春季学期了。第一轮讲下来，我又对讲稿做了修订。以后，每讲一次我都修订一次。最后一次，我甚至又一字一句地重写了一遍，有二三十万字吧，可谓三易其稿了。按照现在通常的做法，到这种程度应该设法出版了。然而，事实上，直到现在这部讲稿还束之高阁呢①。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系里的教学需要，我后来又承担了新兴的传播学课程。当时，我上的“外国新闻事业史”属于基础课，而“传播学概论”还属于选修课。没想到，这个选修课后来仿佛成为我的“主业”，而基础课反倒退居其次了。当然，系里的教学安排只是外因，这里的关键因素恐怕还在于我自身的内因。这个内因就是我既对历史感兴趣，更对理论感兴趣。在我看来，任何学科或研究领域，差不多都由三个层面所构成：一是基础性的知识层面，二是对知识进行系统化的理论层面，三是对理论进行提炼和升华的思想层面。而我一直希望或者说奢望自己的教学与科研，不仅有知识，而且有理论，同

① 这里提到的“讲稿”已于 2005 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全球新闻传播史》。出版之前，又对原稿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修改和增删，详情见该书《后记》.

时有思想。

从开始讲授外国新闻史起，我就一直在为其中的体系、架构及主旨所困扰。显然，这些东西都属于理论与思想的范畴，而不是知识所能解决的。虽然，我的“外新史”课程知识还算新颖、内容也属丰富，而且颇受学生欢迎，就是说教学效果不错。但我心里总觉得，这些东西还是属于“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事情。我羡慕的是司马迁所说的境界，这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尽管自己十分清楚，这样的境界可能一辈子也达不到，但有道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啊。

基于对理论与思想的关注，我就自觉不自觉地介入了传播学领域。1986 年夏天，我在黄山参加了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这次会议对我触动很大。其中不仅有学术方面的，而且更重要的还是获得了一种治学的感觉，从此以后开始有了研究的兴趣。由于这番经历和经验，后来我在做系主任时，就特别鼓励青年教师出去参加学术会议，同时也尽量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我认为，这种机会对他们成长的意义，将远远大于所谓功成名就者的各种“走穴”和“赶场”。

1989 年，受郑州大学新闻系系主任项德生教授的委托和安排，我开始着手准备传播学课程。为这门课程，我写了三四十万字的讲稿。记得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赵忠祥和杨澜主持的那个“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的《正大综艺》节目，万人空巷，举国风靡。我书房对面楼上的人家，夏天开着窗户，电视里放着这个欢声笑语的节目，而我则挥汗如雨地赶写传播学的讲稿，因为那个时候空调还没有进入普通人家。这个讲稿后来经过精练，就成为 1993 年出版的《传播学引论》，2003 年又出版了“增补版”。这部处女作出版后，我又对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发生浓厚兴趣，因为我认为批判学派比经验学派在理论和思想上高出一筹。1995 年，我在报考博士生的时候，最初的设想是研究批判学派的，是想写一篇有关批判学派的博士论文。由于后来师从方汉奇先生，就在中国新闻史领域找了一个勉为其难的题目，这就是 1999 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显而易见，这个转向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它等于把我从外国转入中国，从理论转入历史，从现代转入古代。说实话，当时自己感觉很吃力，甚至很痛苦。但是，现在看来，我却感到这实在又是一次人生与学问的重大转机，就像 10 年前师从梁洪浩先生一样。我这么说决非客气话，而是心里话，是包含着很多的人生体验与思想感受的心里话。比如，如今我在看待西方新闻史以及西方历史的时候，就有了一个互相对比的参照系，在看待许多问题上就逐渐趋于平和、乃至通达，而不像年轻时那么自以为是，有时还那么极端。再如，现在我对清华学生讲，一些年轻人，尤其是一些“精英”，往往是“向上不向下”、“向外不向内”、“向前不向后”。也就是说，他们心里总是瞄着那些发达的、先进的东西。问题是作为中国未来的“精英”，作为国家民族的希望，如果一门心思只想着这些，而对底层的、民间的、广大百姓的生

存状态不关心，不在意，那就不能不令人担心了。这就是向上不向下的意思。所谓向外不向内的意思是说，对外国的、西方的、时髦的东西趋之若鹜，化用杜甫诗句可谓“恨不移民向西土”啊，而同时对自身的、民族的、传统的东西则麻木不仁，漠不关心，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呢？至于“向前不向后”，与前面的意思一脉相连，就是只关心光辉灿烂的未来而不屑于源远流长的历史，以为这些东西都是包袱，扔了包袱，轻装上阵，乘着高科技的飞船，奔向“美丽的新世界”（赫胥黎）。我能形成诸如此类的思想，其实都可以说得力于追随方汉奇先生研究中国新闻史的收获。我庆幸自己在人生与学问之路上，能得到梁洪浩和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他们一个是“外新史”的权威，一个是“中新史”的泰斗，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属于《世说新语》开篇讲的那种“言为士则，行为士范”的人物。从他们身上，我更多学到的还是为人为学的精神和境界，而且他们身上的许多东西，我到现在还在慢慢体会、感悟和咀嚼。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998 年博士毕业后，我去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本来以为，可以接着干自己的“主业”，就是继续上“外新史”的课程。但由于一些非个人的因素，我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直到 2001 年，我调入清华大学之后，才总算又回到新闻史的教学上。不过，这一次可是“中新史”和“外新史”齐上，而且是本科生与研究生兼顾。以至于在外面，人们说我是传播学学者，而在清华人们说我是新闻史学者。其实，这两者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的。因为，没有历史的理论往往是空头理论，而没有理论的历史也往往成为知识的堆积。过去常说“史论不分家”，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以上，我大致谈了自己在新闻传播史教学方面的“经历”，下面再来谈谈自己在这方面的点滴“经验”

刚才，我说到自己来清华后，开始重新承担新闻史的教学工作，而且是中外兼顾。这个时候同 1980 年代初上新闻史的情形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我的人生阅历及学问境界等，都已经大不同于 80 年代。本来，我曾想整理一下那部已经三易其稿的“外新史”教材，然后交付出版。但是，等我翻出来一看，当年觉得不无得意的东西，现在竟然有点不忍卒读。比如，现在大家几乎耳熟能详的萨伊德的“东方学”，就在那部教材里体现得非常充分。为此，我甚至感到汗颜！心想，自己当年怎么会如此起劲儿地鼓吹现在需要反思和批判的东西呢？我开始讲授外国新闻史时，一直为其中的体例、架构及主旨所困扰，其实现在我还是在为这些“宏大命题”所纠缠。事实上，我在追随方汉奇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曾专门钻研了一些历史哲学的东西，并在《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上发表了若干粗浅的文章。比如，《对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建议》（《新闻大学》1996 年冬季号）、《评“古有新闻”的学科公设——兼论新闻的生成及内涵》（《中国人民

大学学报》1997 年第 1 期)、《新闻史有什么用——试论新闻史的当代性》(《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7 年第 1 期) 等。我总觉得,如果不在这些"宏大命题"上缕出一些比较清晰的、一以贯之的、能够给人以启迪与教益的思想线索,那么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的、有时甚至是鸡零狗碎的知识,同那些堆积如山的仓储货物相比,实在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按照我现在的认识,我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无论中外都可以说,一方面颇有进展,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少有待开掘的内容和开拓的领域。在我看来,这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或许还不在于具体的研究事项,如材料的发掘、体例的突破、观点的创新、表述的生动等,而首先在于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如果说以往的所有新闻传播史研究都属于"历史科学"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则涉及"历史哲学"。换言之,我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尚未深究有关学科自身安身立命的问题,而一直以某种似乎不言而喻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黑格尔在其名著《历史哲学》里讲了三种观察历史的方法,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若按这种标准衡量,迄今为止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第一个层面,即原始的历史或"纪念碑式的历史"(克罗齐)。关于这种传统史学及其缺憾,曾任英国历史学会主席的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G·Barraclough),1970 年代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系列丛书之历史学卷里曾写道:

大量的历史著作——也许占全部成果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完全是因袭常规的,虽然增加了大量知识,却没有 (也无意图) 指出新的方向,提出新的方法。

具体说来,这种研究的问题如美国历史学家鲁滨孙在其名著《新史学》(1912 年) 里所做的概括:

⑴ 随便罗列人名、地名,对读者毫无意义,它不但不能激起读者的思想和兴趣,反而使他没有精神。

⑵ 不讲别的重要事情,专偏重政治事实的记载。

⑶ 好叙述非常特殊的事件,不是因为这些故事可以说明一般事物的进展,或某时代的情况,而只是因为它们在编年史中很突出。

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是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的。因为,只有经过原始的历史,我们才能展开反省的历史,进而抵达哲学的历史。正是由于一百年来几代新闻传播史学者的不懈努力,由于他们在历史科学上所做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众多建树,如今我们才有可能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考虑一些涉及根本的深层命题。否则,如果我们对基本史实都不甚清楚,对主要脉络都不甚明了,那么还怎么侈谈"反思"、"批判"或"历史哲学"。就此而言,我们不能不首先对以戈公振先生、方汉奇

先生、张隆栋先生、李瞻先生等为代表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学术传统表示充分的敬意，同时对前辈学人所做的一切研究表示“同情之理解”。

也许由于个人的志趣使然，我对新闻史研究的范式及其深层意味情有独钟，或者说我对其中的一些历史哲学问题比较感兴趣。在多年研习新闻传播史的过程中，面对如山似海的史料总是喜欢追问这些“断烂朝报”的意味之所在。特别是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为了研究“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这个课题，曾专门涉猎了一些历史哲学的著述，自以为大开眼界、颇有心得，于是不揣浅陋发表了若干探讨新闻传播史研究范式的文章。可惜，如今回头来看，这些思考真可谓“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不仅认识稚嫩，论述粗浅，而且甚至怀疑自己所欲言说的主旨是否得到充分表达，从而也就怀疑自己是否自说自话，而并未引起新闻传播史学界的重视。即使如此，我还是觉得，这个问题对新世纪或“新生代”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关系重大，对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继往开来、再上一层楼至关重要。所以，今天我就想着重谈谈这方面的话题。

三个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

大略说来，当代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是以 20 世纪为起点的。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犹如一道隔开“旧史学”和“新史学”的鸿沟。属于旧史学的老一辈历史学家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上，基本延续着 19 世纪实证主义史学传统，特别是德国兰克学派的学术风格与研究精神，其代表性成果是阿克顿勋爵主编的《剑桥近代史》。而新一代历史学家虽然风貌各异，取舍万殊，但在一系列内在理路上却又颇多共通之处，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文”、“史”、“哲”三个方面，具体说来就是三个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以及“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

众所周知，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是出自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这个命题可以概括为这么三层意思：复现历史都表现为现时的思想活动；研究历史都由现时的兴趣所引发；把握历史都按现时的水平去衡量。这三者都展示出历史与现时的统一性，而正是这种统一性使过去的历史获得突出的当代性，用克罗齐的话来说，当代性才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这种认识，同以往那种从“过去时”看历史的视角不仅完全相反，而且迥异其趣。

与克罗齐同时的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步克罗齐的历史观而提出另外一个同样著名的命题——“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命题的旨归在于，将“以往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史学研究改造成为真正能提出明确的问题并给出明确答案的史学”（何兆武）。他认为，“传统的史学是不能担此重任的，因为传统的史学只不过是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或者说剪贴史学”。这个命题与克罗齐上述命题的内在关

系与逻辑线索，是一目了然显而易见的。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当代史的立意就是荡漾在人们心灵中的历史，那么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题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题中之意了。不过，我们这里并不是想专门探讨柯林武德的史学思想，而是借用他的这个命题来说明现代史学的第二个突出特征，这就是注重史学的思想蕴涵、哲学意味和精神追求："用一个流行的比喻说法，即：思想是灵魂，抽掉了思想，历史或史学就将只剩下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在其法兰西学院的课程讲义《论治史》中谈到两类史学家，一类是读过哲学的史学家，另一类是不读或不懂、总之不重视哲学的史学家。与传统的史学相比，现代史学的哲学意识明显增加。最早提出"历史哲学"这一概念、被普希金誉为"把哲学的明灯带进了幽暗的历史档案库"的伏尔泰就指出，写历史要有哲学家的眼光，要写出"哲学的意味"。20 世纪的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更以《西方的没落》，为哲学化的历史树立了一个非凡的典范。他甚至不无偏激地说道："一切真正的历史著作都是哲学，除非它纯粹是一种蚂蚁的工作。"现代史学的这一趋势既是由于 20 世纪以来各种思潮此起彼伏激扬冲荡，也是由于各个学科互相渗透彼此交叉。对于这一日渐突出的趋势，巴勒克拉夫在他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里也特意写道：

人们往往说，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整体总是对哲学论证抱怀疑态度。他们在工作之前并不事先就自己工作的哲学前提作一番讨论。然而，哲学从前门被赶了出去又总是从窗口飞了回来。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当狄尔泰和克罗齐的观点和著作赢得了广大读者时，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甚至对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普通历史学家也发生了愈益增强的影响。这些人一直对哲学毫无兴趣、声称自己的工作纯属经验范围，并且不知假设为何物。

至于"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则同 20 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有关。由于这个转向，语言以及所有的表达形式都被置于十分突出的位置，乃至一事当前人们已经不大谈"是什么"的问题，而是谈"说什么"的话题了。这一点体现在史学领域，就产生了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其代表作是 1973 年出版的《元历史：19 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其中的基本观点就是否认历史著作等于真实的过去，因为它们同样是属于语言的建构与表述，所以历史编纂学和小说（虚构）并无不同，它无非是小说的一种形式。怀特在《旧事重提：历史编撰是艺术还是科学？》一文中重申：

历史学家相信曾经存在过的实体是一回事，把这些事情当做某一特殊种类知识的对象进行构建又是另外一回事。我相信，这种构建活动是一件充满着众多想像，同时又充满着诸多认识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我的计划定位为一项对历史编撰的"诗化"，而不是历史"哲学"进行概念化努力的原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简言之，历史是一种经过构思、想象及编撰的文本，而作为文本的历史同文学等其他文本并无根本差别，它们归根结底都是借助语言而形成的某种叙事或建构："它们乃是言词的虚构，那内容更其是被发明炮制出来的，而不是被发见的，它们那些形式与其文学的对应部分、而不是与其科学的对应部分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

其实，历史与文学的联系可谓源远流长。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文史不分家"，意思是说文学与历史形同一体，难以割裂。追溯起来，这句话是从古代的治史传统延伸而来的。我们知道，中国古典史传往往具有鲜明生动的文学意味，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不妨当文学作品看待。比如，先秦时代的《左传》、《战国策》、《国语》、《吕氏春秋》等，无不文笔鲜活，文采斐然；司马迁甚至被毛泽东径直称为一个"文学家"（《为人民服务》），他的《史记》更被鲁迅先生盛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魏晋风度和魏晋风流画像的文人笔记《世说新语》，在记人叙事上同样出神入化，活灵活现，含蓄隽永，耐人寻味，等等。唐代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在回答古往今来为什么有名的文人多而出色的史家少的问题时，曾将优秀史家的禀赋概括为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即所谓才、学、识。学是指学问，史家不能像文人那样凿空而论，而必须讲求根据，即言必有据，而这些根据就是学问。识则指见识，没有见识，再有学问也难成大家，对此刘知几比喻说，这就好比一个人虽然拥有万贯家产，可惜不会经营，结果无法使家产增值。相反，仅有见识而没有学问，在刘知几看来，又好比一个能工巧匠手头没有工具，没有材料，结果同样一事无成，就像俗话说的"巧妇难为无米炊"。至于刘知几所说的才，自然指文才或才华，一个史学家如果没有文才或才华，那么即便学问很大，见识很高，可写出东西来却了无生趣，索然无味，干巴巴犹如木乃伊，同样难成大家。不言而喻，同时具有才、学、识三长（清季大儒章学诚的《文史通议》又增加一个"德"）的人，古往今来总是寥若晨星，所以刘知几总结说，有名的文人多而出色的史家少。以上这些事例无不表明，中国古代的治史传统，对文笔、文采、文思、文辞、文气等因素一直都是非常注重的。在今天的语言里，历史似乎像个枯索干瘪的老人，而在古代的语言里，历史即"史"却有着才华横溢以至虚浮的含义。比如，《论语》里有句话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说："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这才是个君子。"（杨伯峻译文）孔子这句话里的"史"，就是虚浮的意思。可见，历史在古人的心目中，本来是同灵动鲜活的意象联系在一起的。

进而言之，不独中国古代有这种文史不分的特征，西方及其他文明的古典治史传统也同样如此。比如，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就把一部《希罗多德历史》写得摇曳生姿，妙趣横生。另外，同时期的其他史学名著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塔西佗历史》（塔西佗）、《长征记》（色诺芬）、《高卢

战记》(恺撒)等,也无不以优美的文笔、生动的故事和出色的叙事见长。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在古希腊神话中,司历史的女神克利俄(Clio)不仅属于九位艺术女神之一,而且名列这九位缪斯之首。以至于英国现代史学家屈维廉(G. M. Trevelyen),为批评实证主义史学而发表文章就以《克利俄:一位缪斯》为题。对此,刘昶在《人心中的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一书里概括得好:

以优美的文笔如实叙述过往的人事,对其进行道德评判,从中揭示出历史的道德教训,这就是古典史学的基本特点。一位缪斯加一位道德评判家,这就是克莱奥(即克利俄——引者注)的古典形象。

事实上,直到19世纪初期,西方"历史学著作一直有两大占主要地位的传统:一种主要是学究式和古董式的,另一种则本质上是文学式的"。只是到了近现代,伴随科学理性的无限扩张,特别是19世纪以孔德为先驱的实证主义大行其道,这种文学化或叙事化的史学传统才开始遭到质疑,遭到轻略,最终被打上"非科学"或"不科学"的烙印而退居边缘。

以上三个命题互相关联,一气呵成,分别对应着真(当代史)、善(思想史)、美(文学史)。它们的共同特征一言以蔽之,就是将史学从以往的客体本位转向现在的主体本位,同时也就从鸡零狗碎的"断烂朝报"或编年史的"木乃伊",变成一种洋溢着青春、生命与活力的"有机体",变成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活生生图景,从而为人生在世提供更富有意义的价值参照。

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三种类型

可惜春风不度玉门关,上述这些在历史学界激扬冲荡的思潮,似乎还远远没有波及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这个学科领域依然还是传统史学的一统天下,在历史研究上依然践行着实证主义的"如实直书"、"史学就是史料学"等路数,在历史观念上依然遵奉着爱德华·萨义德所揭示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Orientalism)。虽然如前所述,这种路数的研究具有基础性和奠基性的作用,但基础毕竟只是基础,而不是建筑的主体。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史料的搜集和事实的罗列,那么所谓新闻传播史充其量只是了无生意的编年史或资料汇编,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就像亨利·贝尔(Henri Berr)所说的,史料的搜集并不比集邮或搜集贝壳有更大的科学价值。

如前所述,任何学科包括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都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层面,即知识、理论和思想。知识自然构成每个学科的基础,理论可谓系统化和条理化的知识,而思想则是从理论中提炼的精华。比如,经济学的知识多如牛毛,而形成一套类似剩余价值理论的已屈指可数,至于达到马克思那种思接千古、视通万里、酣畅淋漓、博大精深的思想境界者更是凤毛麟角。由此说来,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知识及其积累的层面,同时也应向理论与思想的层面拓展,借用何兆武先

生在谈及柯林武德史学要义的一段精当论述来说：

史料不是史学，史学是要建筑一座大厦，而史料则是建筑这座大厦的砖瓦 建筑材料无论有多么多，都不是建筑物本身。史实的堆积和史料的考订，充其极也只是一部流水账，要了解这部流水账的意义，则有赖于思想。史家是无法回避思想理论的，尽管剪贴派史家曾用种种方法来抗拒理论，包括以剪贴现成理论文献的方式来抗拒真正的理论；——史学有史学的义理，既不能用考据本身代替义理，也不能以考据的方式讲义理。只有通过思想，历史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形成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只有透过物质的遗迹步入精神生活的堂奥，才能产生真正的史学。

如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已成为时代的普遍共识，新闻传播史研究同样面临开拓创新的局面。因为别的且不论，仅仅对学生的专业学习而言，目前这套新闻传播史的知识体系就有待改进。比如，众所周知，如果不是学分的要求，不是考试的逼迫，恐怕没有多少学生真正愿意主动地研习新闻传播史。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似乎成为同他们的兴趣、追求及人生了不相关的“身外之物”，既没有多大意思，也没有什么意义。其实，新闻传播史如同真正的历史一样，从来不是僵死的干尸，而是同当代社会、现实人生及专业理想息息相关的构成要素，看似既往的一切新闻传播活动同样也是当代的记忆、当代的投影、当代的延伸，同样也是同生成的当代世界骨肉相连、血脉相通的。

说到这里，有必要廓清一下新闻传播史这一概念。从含义上讲，新闻传播史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指人们在新闻传播领域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另一个层面指人们对这些活动的回忆与思考。其中，前者可称为新闻传播史本体，后者可称为新闻传播史认识。就本体而言，新闻传播史是客观的、外在的，是独立于人的意志和行为的 就认识而言，新闻传播史又是主观的、内在的，并且只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中，只取决于人们眼下的所知所识，所思所成。按说，新闻传播史的认识在于完整准确地把握新闻传播史的本体，就像一张纸的背面是其正面的“翻版”，但是由于认知能力的种种局限，无论人们怎样努力都难以企及这一目标。于是，人们所说的亦即所知的新闻传播史总是某时某处力所能及的新闻传播史认识，而不是外在于己并且已成定局的新闻传播史本体。德国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一书里曾从“物理事实”与“历史事实”的分野上论述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历史世界是一个符号的宇宙，而不是一个物理的宇宙，所以历史事实与物理事实并不属于同一类型：

历史学家像物理学家一样生活在物质世界之中，然而在他研究的一开始他所发现的就不是一个物理对象的世界，而是一个符号宇宙——一个由各种符号组成的世界。他首先就必须学会阅读这些符号。一切历史的事实，不管它看上去显得

多么简单，都只有借着对各种符号的这种事先分析才能被规定和理解。除了各种文献或遗迹以外，没有任何事物或事件能成为我们历史知识的第一手的直接对象。只有通过这些符号材料的媒介和中介，我们才能把握真实的历史材料——过去的事件和人物。

总之，新闻传播史这一概念说来说去仅仅是指新闻传播史认识，至于新闻传播史本体则如所谓“无限大”一样，只在理论上成立而在当下的现实中并不存在。既然新闻传播史只是流变不居、与时俯仰的认识，而非一去不返、永恒不变的本体，那么新闻传播史与当代的关联便顺理成章，新闻传播史不属于消亡的过去而归于生动的现实便成为显而易见的结论。比较一下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和方汉奇先生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对此就一目了然了。这里的区别不在于“本体”方面发生什么变化，而在于“认识”方面有所不同，用柯林武德的比喻，史家犹如演员，他们必须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剧本还是那个剧本，只是演员换了人。

由于忽略新闻传播史本体与新闻传播史认识的联系、分野及区别，以及由此而来事实上只专注于本体而轻略认识，甚至取消认识的核心意义或将认识降到从属地位，所以迄今为止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只在那个看似实在而实则虚幻的新闻传播史本体领域徘徊，并且由此形成两大类型，一是自然科学式的研究，一是社会科学式的研究。所谓自然科学式的研究，也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式的研究。比如，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办了某份报纸，或某年某月某日某国有了几家电台、几个频道、几家网站等等，这些都是铁板钉钉无可置疑的。至于社会科学式的研究，则力图探求各种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及其动因，用一种起承转合的逻辑线索和分门别类的认识范畴，将它们归纳为一幅如此这般井然有序的历史图景。这些类型的研究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有意义的，比如前者提供了许多新闻传播领域的基本知识与一般常识，而后者则为新闻传播活动提炼了一些有所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有所启发的历史意识。

与此同时，毋庸讳言，这些研究的局限性也非常突出。其中，最突出的是它们都仅仅关注新闻传播史的本体，而没有充分意识到新闻传播史的认识问题及其意义。比如，我们往往以为只要充分掌握史料，就可谈论新闻传播史研究了。殊不知，“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没有哲学的头脑、理论思辨和分析的能力，他对文献再熟悉，搜集的材料再多，搞出来的也只是资料汇编，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刘昶）。再如，传统研究无不视考证为基本功，以为只要精细地考证史料，再加以适当的剪裁与拼接也就能形成严谨而扎实的研究了。然而，依据 20 世纪的“新史学”，这种考证癖归根结底是源于对精英的重视和对常人的漠视。因为，作为传统史学的工具，考证只适用于对历史上少数精英及其行止的研究，“一旦要研究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研究影响这普通人生活历史的各种各样因素，考证方法就用不上了。一方面，

是缺乏足够的和系统的历史记载以资考证，传统的历史根本就忽视普通人和这众多的因素；另一方面，即便过去的历史记载中留下了足够的材料，我们又如何能够对其一一加以考证呢？”（刘昶）

基于上述问题与前述理论，我个人认为，在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领域，还应补充一大类型的研究，即与新闻传播史的认识息息相关的人文学科式研究。其实，在所有学科中，历史与人的关系最为真切，史学实际上是人学，文德尔班甚至把人定义为“有历史的动物”，缺乏人文气息与人文精神的史学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是没有生命和灵魂的。何兆武先生对此做过深刻的阐发：

我们有三个层次不同的世界：自然的、社会的、人文的，或者说人对物的、人对人的和人自己心灵的生活。历史学的固有领域是人文世界；它固然也牵涉到自然和社会，但并不就是同一回事。人的思想和活动虽然也涉及到或包括自然的与社会的活动，但并不仅仅就是自然的和社会的活动而已。所以我们不能把对人的研究（历史学）简单地归结为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的（如饮食男女）或社会的（如权力和财富），尽管这些方面也包括在历史学的范围之内。但它们严格说来只是提供必要的背景，而不能充分解释人文活动自身（例如对真、善、美的追求）。归根到底，历史学既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社会科学，而是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

虽然何先生说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但对新闻传播史的专门研究同样具有针对意义，同样有所启发。

那么，人文学科式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应该包括哪些特立独行的内涵呢？首先，自然是与人的内心相通的思想、灵感、想象、体悟等所谓“主观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标举“客观性”的自然科学式研究与社会科学式研究看来，似乎都是需要绝对摈弃的。而事实上，恰恰是这些看似空灵虚幻的东西，赋予历史包括新闻传播史以生气流溢的活力和历久弥新的魅力。瑞士史学家、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而享誉世界的布克哈特，在一封信里曾经这样写道：“对我来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诗；它是一系列最美最生动的篇章。”我们不妨打个比喻，自然科学式的研究只是为史学提供必不可少的建筑材料，社会科学式的研究开始专注于建筑物内部的比例关系及其科学定律，而人文学科的研究则属于建筑师内心的意匠经营了。如果没有这种意匠经营，那么即便有再多再美的砖瓦石料、再精再细的建筑定律，也还是无法孕育辉煌的故宫、壮美的金字塔、宏伟的罗马斗兽场等。换言之，人文学科式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旨在追求活生生的历史，力图“复活”历史，而不仅仅是“复现”历史。

当年，蒙森就任柏林大学校长时发表演讲，指出历史学家或许更多地是艺术家而不是学者。实际上，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或者说既是科学，更是艺术。所以，史学家应该既是科学家，又是艺术家，或者说既是科学家，更是艺术家。正如卡

西尔所说的，伟大的史学家既是经验主义者，又不缺乏诗人的精神：

在探索真理方面，历史学家像科学家一样受制于同样严格的规则。他必须利用一切经验调查的方法，必须搜集一切可以得到的证据并且比较和批判他的一切原始资料。他不能遗忘或忽视任何重要的事实。然而，最终的决定性的步骤总是一种创造性想象力的活动。……真正的历史综合或概括所依赖的，正是对事物之经验实在的敏锐感受力与自由的想象力天赋的结合。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还在于人文学科式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及其要义，归根结底同样是为了追求一种所谓“意义”，具体说来就是理想、价值、精神的境界、生命的张力等。面对纷纷攘攘的过眼云烟即历史，我们不能只是“客观”关照，“如实”述说，“冷眼”应对，不能只是做“壁上观”，仿佛《浮士德》里的斯芬克斯：

我们坐在金字塔前，
阅尽诸民族的兴亡；
战争、和平、洪水泛滥——
都像若无其事一样。

在展现新闻传播的历史图景，描绘其间波澜壮阔、多姿多彩的历史画面之际，我们同样需要贯注一种深沉而博大的人文情怀，需要怀有一种慈悲而同情的人生感悟，需要提供一种高远而美好的人世理想。如果说，在新闻传播史研究中，铺陈知识和勾勒规律犹如画龙，那么追寻意义就好比点睛，而点睛之笔不仅来自研究者对新闻传播史的感悟、体察和会心，而且源于他们对人生的理想、热情和信念，因为“一切历史和人们对历史的体验（历史学）都要由历史学家的人文价值和理想加以统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